

人类学视野中的安多藏区研究

RENLEIXUE SHIYE ZHONG DE
ANDUO ZANGQU YAN JIU

苏发祥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

项目批准号: NCET-04-0187

人类学视野中的安多藏区研究

苏发祥 / 主编

RENLEIXUE SHIYE ZHONG DE
ANDUO ZANGQU YAN JIU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学视野中的安多藏区研究 / 苏发祥主编. —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660-0454-3

I. ①人… II. ①万 苏… III. ①藏族—民族地区—民族人尖学—西北地区—文集 IV ①K28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1637 号

人类学视野中的安多藏区研究

主 编 苏发祥

责任编辑 李 飞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2.37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454-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1. Toni Huber 著 梁 艳 译
安多藏区及其现代变迁 (1)
2. Luran R. Hartley 著 苗运长 译
安多地区“发明的现代性”
——发展社会中藏族传统文化作用的视角 (12)
3. Susan E. Costello 著 罗 南 译
安多的当代文化产业经济学 (32)
4. Toni Huber 著 桑德杰布 译
在“朝圣”语境中理解“圣地”
——反思西藏的朝圣仪式 (49)
5. Samten G. Karmay 著 王 媛 译
朝圣嘉绒墨尔多神山 (87)
6. Lawrence Epstein & Pen Wenbin 著 才让卓玛 译
甘加和墨尔多：藏东两个朝圣地的空间社会建构 (101)
7. Toni Huber 著 龚 摘 译
恰都尔山仪式的复兴与革新 (129)

8. Katia Buffetrille 著 曾吉卓玛 译
安多的青海湖及其岛屿
——传说与圣迹 (155)
9. Dpal ldan bkra shis、Charles Kevin Stuart 著 梁 艳 译
一个安多藏族村落新年出神灵媒仪式 (183)
10. Mona Schrempf 著 曾吉卓玛 译
土牛和雪狮 (190)
11. Lawrence Epstein、Peng Wenbin 著 梁 艳 译
仪式,族群和代际身份认同 (213)
12. Charlene Makley 著 王玥玮 译
中国改革开放后安多藏区的性别关系与身份认同 (239)
13. Elliot Sperling 著 林朵央美 译
关于安多祁家部落和两个祁氏家族的研究 (283)
14. Robert B. Ekvall 著 苏发祥 译
20 世纪中叶甘、青地区穆斯林与游牧藏族的关系 (295)
15. Mark Stevenson 著 安晶晶 译
1978 年以来安多热贡地区的艺术与生活 (313)
16. Alexandru Anton-Luca 著 白赛藏草 译
安多地方的“鲁”和“拉伊”
——当代藏族民歌介绍 (335)

17. Kengokonishi 著 索朗卓玛 译	
苯教寺院教育制度的恢复	
——以当今安多夏尔阔山巴寺为研究案例	(363)
18. Angela Manderscheid 著 王 蕾 译	
一种游牧生活方式的复兴	
——壤塘牧民的生存策略	(374)
后记	(391)

安多藏区及其现代变迁

Toni Huber 著 梁 艳 译

回想那羊肠小道上的安静与平和，
与之相对的是拖拉机和汽车驶过高速公路的嘈杂喧闹，
这些诅咒遍布厚重的群山之间，
我想念我的族人和我们的故乡。
千束美丽和耀眼的光线出现在我的眼前，
展现一条路给我，
迫使我走向了高速公路的方向。^①

这些诗句是 1984 年由安多的藏族诗人端智嘉（Don grub rgyal, 1955—1985）创作。作为他在通向自己村庄简单的山路上的个人感想，向我们揭示了对往昔事物的留恋、厌恶、强制的混合情绪和试图跨越单纯的藏区乡村生活和脚下强有力的现代化之间巨大差距的强烈愿望。他的诗句充分地表达了许多当代藏族所感受到的冲突性的情感，以及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世界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所经历的大量和前所未有的现代变迁的深思。事实上，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学术型的观察者已经开始对现在中国藏族人居住区域的这种变迁和它的结果做系统的评

① 让卓（Rong grol）端智嘉（Don grub rgyal）（1997：65）

估了。

《转型中的安多藏区：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与文化》中所收论文均包含了对安多现代藏族人生活和态度的最新研究的成果。^① 安多（Amdo）是一片覆盖了东北藏区高原的广大区域。所有的撰稿人都在进行对西藏高原的研究，且关注安多藏区社会与文化复兴的方方面面。这种复兴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地区更宽松政策的实施而出现。

《转型中的安多藏区：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与文化》中的每一章都关注在贯穿“后毛泽东时代”所实行的被称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大框架中一系列新的可能性下藏族人的反应和自我表达的意愿。撰稿人也集体探索了大量关于安多藏族人如何实践和参与各种关于他们区域的现代化的相关和关键的问题。作品涵盖了不同类型的却又常常相互影响性的发展领域：藏族语言和教育、身份认同和性别认同、藏文文学和出版、艺术和表演、宗教生活、旅游、经济和社会组织、文化争论等方面。当这些著作呈现在藏学研究的学科领域内时，他们还必须将自己定位在更为广阔的中国当代人类学的领域中，这些领域的大部分，用史蒂芬·哈尔（Steven Harrell）的话说，他们应该呈现出探索互相联系的两大辩证主题：在高级社会主义中对社会和知识毁坏、恢复的主题和虽然对现代化愿景强烈但并不能明确界定的进步的主

① 这些文章最初是作为论文出现在一个名为“1980 以后安多藏族人社会和文化的复兴研讨会”上，其作为 2000 年 6 月在雷登举行的第九届国际藏学研讨会的组成部分。马修·开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的投稿作为会议中的关键论文是最先被寄来的，莫纳·史丽芙（Mona Schrempf）在研讨会上由于个人原因不能呈交她的论文。比安卡·霍勒曼（Bianca Horlemann）被邀请是由于她的章节被作为此卷的附录。在这里我想谢谢汉克·布莱则（Henk Blezer），奈吉尔·邦德（Nigel Bond），维多利亚大学人文与社会学学院。

题。^① 此外，他们的研究都反映出安多研究中令人鼓舞的最近的取向。学者们现在能在田野中进行广泛的调查，学习当地的藏语，使用藏文和汉文的资料。安多视角对什么是“西藏”、谁是“藏族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看法——有时是具有挑战性的——这个看法是相对于上述问题更普遍和广泛的观点，即由中部和西部西藏和喜马拉雅边境有关的特别知识主体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那种观点。

安多是相当著名的，因为它作为更大或者族群上的传统“三大地区”之一。然而，这个区域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族群、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实体，令人满意的界定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一个藏族人都知道安多，但很少有两个人能够给出一致性的答案，采用藏文资料给其定义让人更困惑。安多现在没有，从来也没有在空间和时间上是单独的个体或者是互不关联的，所以在这儿虚构或者添加一个安多的准确定义对我们没有任何益处。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被今天藏族提到的安多这个地区必须包括西藏高原的东北部，那里的人们认为自己属于族群上的藏族，在某种意义上分享共同的语言、历史、起源传说、生活方式、文化体系和身份认同。他们大都居住在中国西部的几个省份，并且在识别出他们在历史和数量上的优势的大部分区域目前被作为藏族自治州来管理。

总体来说，安多藏族主要居住在青海省的大部，包括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还有甘肃省西南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和羌族自治州。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安多人住在青海的海东，这里坐落在青海湖的东侧和西宁的周围，但是他们只是那里总体人口的少数（8.5%），所以这片区域并不享有自治州的地

^① 哈尔（Harrell）（2001：140）

位。广大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在青海湖的西边，也有少数的藏族人口（10%），这个州只有东边部分的藏族是安多人。我们发现跟这些区域毗邻而居的地区使用多种形式的藏语口语，操这些语言的藏族也被互相认为作为属于“安多话”的群体。

一些社会学家缺乏充分的理由就将其定义为藏族的“亚种族区域”。我们发现在安多的许多地方有相当数量的其他族群的人口生活在藏族社区中。汉族散布在整个区域，然而他们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因为现代共产主义国家的建立而新进入的迁移者。这里有一个证据是某些汉族人社区在安多藏区的建立——最初常常是戍边部队——在一个非常早的时期，但是大多数是中华帝国的明清两代。而仍然有其他人在1949年之前的民国时期的骚乱中到达这里。现在有超过60%的汉族人居住在广阔的安多地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市和城镇——几乎所有区域的各种自治机构的行政地位最初都是为少数民族而建立的，最显著的是藏族。

蒙古人也是安多地区长期居民，首次到达这里是成吉思汗时期，而特别是明代有一系列移民的高潮。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大多数安多的蒙古人高度藏化，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现在很难辨别出他们最初的非藏族特色。蒙古人也住在安多藏区中的各个地方。他们的藏族邻居经常称他们为“霍”（Hor），这是一个为他们所拒绝的名字。^① 蒙古人也许是这个区域古老土著的证据非常有限，有意思的是一些藏族人也认为他们“rgya ma bod”，意思是“既非汉，也非藏”。另外，我发现安多四个不同的穆斯林群体也跟藏族人住在一起，他们是：说汉语和当地语言的占据主

① 霍（Hor）是对回鹘（Ulgurs）一种古老的藏语称谓，也在随后被用来指藏区的蒙古移民。官方的汉语称谓是土（也叫土族，土人），这也不被当代的蒙古人所赞同，因为这在说汉语的人中常常含有轻蔑的意思。

导地位的回族，说突厥—阿尔泰语系（Turkic-Altaic）的撒拉族，说蒙古—阿尔泰语系的保安族和东乡族。^①

作为一个有着众多不同群体的区域，安多的族群概貌常常很难清晰的分成互不相关的单元。上面所提到的相当数量的非藏族群体的个人和社区也常常说安多藏语，有一小部分也识藏文。事实上，在安多的许多社区，不论是哪种族群，多语现象很普遍，而在今天汉语是通用语。相当数量的安多藏族的农业人口保留着起源的叙述，是关于他们祖先作为雅砻王朝的帝国军人如何从遥远的西藏南部、西部、中部来到这片区域的，他们最终移民到了东部。^② 隐含在这种方式的记叙中的倾向在今天被用来宣称其族群传承和身份的纯度。然而从西藏高原的其他地方来的帝国时代的移民者是某种有局限的证据，诸如起源的故事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在安多居住的所有非藏族人群体中的个体间的混合和通婚于藏族社区形成变化的阶层。目前，族群间的通婚在藏族人和非藏族人混杂而居的地方受到特别的宣扬，当地政府鼓励这种通婚。安多的“藏族人意识”具有如此模糊的边界不是新鲜事物，而是已经持续了数世纪。

① 在安多地区非汉族的人口比例大概是：藏，1,000,000；蒙古，青海600,000，甘肃藏区400,000；土族，200,000；撒拉，90,000；保安，12,000；东乡，200,000（2001：10）采用了多样的汉文资料（也有 Marshall & Cooke 的数据，1997）尽管未来应该查阅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它允许被利用的时候。

② 与之相比，一些人观察到在安多的牧民社区的一些基础神话中常常宣称本土的、神秘的起源。

当代安多的变迁

无论是我们选择定义安多和还是其他的藏族人群体，当代存在的这种支配性的特征是一种不可预知性的改变，在不到一代人的短时间内作用于它所有的居住者的生活之中。

为勾勒出研究所涉及到的不同地区所发生变迁的类型，即主要是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以来安多藏区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此简明扼要地介绍 20 世纪发生在该地区的一些主要发展情况是很有用的。

当代安多的政治和历史是非常不同于更广为人知的中部和西部西藏区域，后者包括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它们二者从开始就区分明显，关于在西藏自治区内藏族人历史与经历的通常描述并不能被简单的认为和东部藏区一样。一个例子是：前现代时期的在拉萨建立的达赖喇嘛的甘丹颇章政府包括了中部、西部和西北部的西藏成为一个（尽管是复杂的）政治实体，而高原的东部区域被广泛存在的大量小型传统政体所覆盖，其犹如草原上的无政府部落社会。另一个重要的不同是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安多所有藏族人社区均已合法的归于中国政府管辖，犹如在高原西南部的第三大藏区康“省”一样。尽管甘丹颇章政权对这些东部的区域保有一定的兴趣，但安多是一个离散的政治和社会实体，而且，在他们整个区域安多藏族已习惯了中国的管理系统的存在。帝国在安多的管理是建立在分封世袭的当地藏族人头领，通常称作土司。然而，在大部分藏族人区域的牧区和农区，汉族人的影响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土司是有影响力的存在，作为一种法律作用于人们，人们在他们的领导下保护当地的

领土，作为中央政府和西藏政府两者之外的一种独立存在。

1911年革命后，回族军阀马氏家族在安多地区获得了持续增强的影响力。一系列的领导成员皆出自马氏家族，作为青海长官而出现，在民国最后二十年中统治这个区域，在藏区域展示了经常性的残暴的一贯做法。民国政府在1931年废除了无效的土司制度并创建了一系列的县，由指定的汉族或者回族移民进行管理，因此带给安多每个藏族人区域的相同的中央政府结构。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采用了早期的民国制体系，基本没有改变安多当地政府的基础直到今天。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藏族自治州被新建于早期存在的藏族人占主要人口的这些区域的县制系统基础之上。这个发展是立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策，结合宪法中面向少数民族的政策。它跟西藏自治区是相同的系统，在这些县的基础上随后建成了自治州。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安多逐渐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包括：着手进行历史调查和人口普查，宣传运动，基础设施的建设，所有这些导致了第一次集体制的参与，这在安多开始于1956年。其被1956—1959年的安多地区的动乱所打断。在接下来的十年是更为显著的“民主改革”，其作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卷入的人们被用阶级进行分类和建立公社，这两者都伴随着对传统藏族价值和习俗的系统性批评和弃绝。

到1970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了增加产值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改革。这些改革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进行了检验，并于1980—1984年在藏区实施的所谓的“家庭责任制”和“奖金”制下达到顶峰。这些变化是整个中国不断发展的国家性的经济体系的重建和发展的一部分。这个时期也是藏族人首次享受到了一系列更多的自由政策，事后看来，今天他们通常认为这是后毛泽东后期中国政策的伟大转折。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了一系列里程碑的改革政策。主要是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们的革新，这些改革覆盖的不仅是经济问题，也包括一系列和文化生活相关，社会自由和语言使用等。特别是给予了少数民族更多的自治权，国家甚至认可并支持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包括宗教生活、艺术表演、当地方言等。也承认了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过重的背景，从前主导的个人主义开始恢复，一些破坏或者财产损失的补偿开始由国家来实施。

这个时期邓小平改革的议题现在常常被描述成“复兴”或者“恢复”。它被认为是一个复兴因为随着几十年来在毛领导下来的僵硬的和经常压抑性的政策的结束，允许藏族人在更广阔的范围去探索——然而只是暂定的——新的或者重新发现古老的主动性和实践，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主导生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如何认为和表达他们的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问题是令人烦恼的，是因为某些共同的“安多意识”的显露经常很难捉摸，因为更多的证据是人们从安多旅行到外面的区域比呆在家里要多。在所有最近关于安多藏族人身份认同的讨论中，它所显示的有趣的这一特点常常被低估。中国国家机构和政权扮演的角色是促进藏族人身份认同的构建。早期的现代化成果，包括集体主义和对少数民族的民族分类，对今日安多许多藏族社区界定自我的方式留下了持久性的影响。^①更进一步，国家支持的各种藏文媒体的消费也和教育机构一样，特别是在安多方言上的存在，这些潜在的统一元素是最明显的身份认同制造。不能说藏族人的身份认同仅仅是国家的产物而藏族人在此过程中只是被动接受者。相反的是，他们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主体。问题是，关于藏族的文化是什么的观点和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期它应该变

^① 如奥普敦（Upton）（2000）关于白马藏族的个案。

成什么样子，这些问题经常通过一些相同的机构频繁地出现在公共媒体中。藏族文化的公共呈现理所当然是在当代中国舆论所允许范围内，尽管如此，他们也拥有了一个比以往更广泛的潜在的藏族人听众群体，这多亏有大量媒体和教育的出现。

当思考 1980 年以后这一段时期的安多时，还应该意识到在藏族地区国家政策的发展和实施从来都不是直线型或者整齐划一的。安多的藏族人社區总是不得不应对当国家和地方规划者的指示拜访他们时更基层的政府不可预期的变化。这能从最近的两个例子中清晰地看到：一个是经济，一个是社会文化。例如，安多地区的藏区牧民面对政策的持续变化，而这些政策跟控制他们的两大资源——牧场和牲畜有关。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的以前公社牲畜的再分配和以前牧场社区权力的恢复引导了和牲畜和草场有关的公正流动情况。藏族人从中感受到了他们有了一种多样化的选择和战略上的可用性。然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藏族牧民们经历了一个更加完善的政策，旨在加强对安多草场的管理，伴随着个人承包形式的发展和牧场使用，还有不断增长的定居和对畜群规模和构成的限制。

与此相似的是宗教生活，20 世纪 80 年代初是藏族地区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旨在重建从前的佛教和苯教的寺院社区，恢复和支持僧侣个人在宗教中的学习、教学和仪轨生活。藏族人对于新的宗教自由谨慎的试探之后，寺院隐修中心和他们的仪式传统便雨后春笋般地遍及安多藏区，是一场显著的宗教复兴。然而，随着 1996 年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到来，繁荣的寺院社区突然发现他们自己需要经受意识形态的一种再教育，特别有关于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宗教的地位。他们也经历了每个社区住寺僧人的法定年龄和总数甚至更严格的限制的要求，这个政策对宗教团体和个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体上来说，当我们思考在安多藏族人现代变迁过程中上述

或者其他例子时，观察者必须仔细考虑国家政策并不总是与当地的水平整齐划一的。一个自治州和其他的自治州，或者甚至村与村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的确，在政策实施的地方，自治的特定程度是通过一系列地方的许可和管理依照法律而获得认可的。研究者和他们的读者一样要小心的是在安多藏区观察和叙述的不是必须反应周围地区的事务状态，而是考虑包括了易于推广到一个更大区域。

而且，在藏区改变和多样性不断变得复杂，诸如安多的社会、文化、经济甚至自然景观因为其他因素在以更快的步调变化。大量的有计划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在国家最近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开展，伴随的是在不可预期的大范围内安多藏族人生活的改变。在日常生活中各级政府的不一致和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之间已产生了巨大的差距。例如，今天，在这些地区，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年轻牧民能在他们当地村镇的“虚拟空间”里网上冲浪，在DVD上观看盗版的最新好莱坞大片。但是，当你拜访不远处靠近山谷的他们的帐篷时，你也能发现在物质生活简朴得令人吃惊，缺少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诸如足够的饮用水、住处和简单的医疗设施。

来自中国各地的大量移民和游客进入安多，正在建设一个当地的藏族社区与更广阔的地域，甚至与全球化背景密切相关的新世界。藏族人只有不多的机会，但必须使他们自己在各个层面融入这个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安多人也更多的暴露于来自中国之外的非汉族旅游者面前。近几年，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普遍宽松的进入政策，安多已成为不计其数的或大或小的基金援助和发展项目、秘密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常常打着救助的旗号）、环保活动、旅游探险和学术研究的中心。所有这些跟国外机构有关的交往在安多藏族人的生活中留下了或大或小的印记。

必须要承认的是所有这些在安多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方

面的现代发展和变化之影响仍然很难被外部的观察者所清楚认识到。例外的是有很少的区域学者已经设法完成了相当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系统性的收集了数据。总体而言，我们几乎无暇顾及大多数安多藏族人在过去更加开放和经常性的加快改革的二十年中经历的快速变化。

《转型中的安多藏区：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的贡献就在于，为我们更好的理解当代安多藏族的生活状况、此种生活状况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它是如何急剧变化地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参考文献

安德鲁斯·格鲁斯克：《安多（青海）的文化遗址》，孟买：白莲出版社，2001年。

斯蒂文·赫瑞：《改革的人类学与人类学之改革：在中国的再发现与进步的人类学叙述》，载《人类学评论》，30，139-61，2001年。

斯蒂文D·马绍尔，苏塞提·库克：《西藏自治区之外的藏区：中国特色的开发、同化与发展》，华盛顿特区：《西藏研究协会》，CD-Rom，1997年。

让卓·端智嘉著，马克·斯蒂文森、喇嘛却喀宇托翻译：《细线般的小路》，载《西藏杂志》，22：61-66，1997年。

珍妮·奥普敦：《一部土著藏族民族志之注释：毛尔盖·三木旦关于白马藏族论文的介绍与译注》，载《西藏杂志》，25：1，3-26，2000年。